

胶南市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南临黄海，北靠胶州市，东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西与诸城市、五莲县、日照市相连。2003年，全市陆地面积189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500万亩，人口84万。

早在新石器时代，胶南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两三千年之久。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令各县建区设乡，市境分属诸城县第四、第五、第六区和胶县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区。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规定，“县界应以地形及战争需要重新划分，并不受旧行政县界的限制。”1943年11月，中共滨海区一地委在今胶南市境内第一次建立了县级政府——诸胶边办事处。之后，又设立了两个县级建制，南部为藏马县，北部曾沿用过诸胶边县、诸胶县、珠山县、胶县等称谓，1946年9月定名为胶南县。1956年2月，藏马县撤销，其大部分区域划归胶南县。1991年1月胶南撤县改市，属青岛市辖县级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胶南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从此，胶南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

阔的实际斗争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并积极展开建党工作。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接着，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代表着50多名共产党员，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成立了党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是以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 and 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的政党；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参与领导了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复兴之路。

第一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胶南党组织

(1927 年 8 月—1937 年 7 月)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以陈独秀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味迁就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受到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其后的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胶南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胶南的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

第一章

党组织建立前后的胶南社会状况

大革命失败后，军阀张宗昌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使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山东各地更加尖锐化。

胶南人民面对强大的敌人，组成大刀会，举行了武装反抗封建势力和军阀的英勇斗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势力，锻炼了群众，积累了经验。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胶南形势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成立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然而，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兵戎相向。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实行独裁统治，于 1928 年 4 月继续“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6 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乘

火车退往山海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年底，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排除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宣布易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盘踞在山东的督军张宗昌宣布山东独立，自任总司令，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日本在政治、财政、军械等方面的继续支援。张宗昌以“保境安民”为幌子，变本加厉地剥削劳苦大众，妄图维持其在山东的统治。国民党新军阀北上，打败了张宗昌，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在山东的统治地位。1928年5月，张宗昌的余党——前混成旅旅长顾震（自称保安司令）部逃往胶南王台镇。所经之处，百姓大遭其殃，粮财等收藏不及均被抢掠一空。他们到处抓人为其运送，不愿去者即遭捆绑吊打，一个60多人的连队就抓了100多名民工。为防民工逃跑，竟将他们用绳子捆成串押解。到王台后，逼粮、捐款、绑架、抢掠，无所不为。军队的给养及一切费用开支全部由当地百姓承担，稍有不及，便施以非刑，闹得群众不得安宁，直至1929年2月被杨虎城部打跑。1930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令陆军73师师长展书堂率马步军第二混成团抵王台镇，在胶县警察队、保安团的协同下，到小珠山地区镇压民众，枪杀40余人。8月16日，展书堂率部离县。11月，韩复榘又派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第十四军军长曹福林部占据王台镇。同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65旅旅长唐尧逊部来胶县，除28团3营留守胶县城外，余部随曹福林部进驻王台镇。

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及《区自治施行法》。同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令各县建区设乡。胶南境内分别设立了归属诸城县的第四、第五、第六区和归属胶县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区。1931年春，各区成立区公所，下设37个乡镇。各乡镇相继组建了自卫武装。各乡自卫武装在原有团练基础上改为联庄会。联庄会先由各村抽丁，后改为雇丁组建。这样，本来就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胶南人民，在国民党新旧军阀的争斗中和国民党区乡政府的压榨下，更是苦不堪言。在政治上，国民党强化乡村统治，实行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村级10户为一甲，设甲长1人；10甲为一保，设保长1人，保队副1人。保甲制实行连坐法。各村的保长多由地主豪绅充任。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则兼并土地成为新兴地主。在经济上，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这期间，国家赋税不断加重，田赋除正税外，增加了所谓教育附捐、讨赤附捐、临时附捐、警备附捐、公路附捐等苛捐杂税十几种。之外，反动军阀流寇索要的给养，地方反动政权以“剿匪”名义摊派的各种杂捐，联庄会及区乡政府内地主豪绅们大肆挥霍的所谓办公费、招待费等，统统由农民承担，不计其数。境内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农民背上三把刀，租子重，利息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还把宗教作为侵略工具，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和侵略。他们在胶南多处地区建教堂，办教会，发展教徒和会员。这些传教士笼络地主豪绅、地痞流氓到处“劝教”威胁、利诱、欺骗广大农民入会，有的村全村几乎都成了教民。其中设在王台镇当铺街的教堂有教徒 300 多人，设在灵山卫荒里的天主教堂有教徒 200 多人。教会与官府勾结，操纵地方政权，包揽民事诉讼，敲诈勒索，窃取情报。教会的神父、牧师装出“慈善”的面孔，无耻地宣扬“安分守己”、“打不还手”、“死后升天堂”等奴化思想，麻痹人民。

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大批的洋布、洋线、洋油、洋火、洋烟等洋货充斥胶南城乡，当地的粮食、花生、食油、鸡蛋、猪皮、山果等土特产品，被侵略者低价收购而去。一些大地主、大商人见经商有利可图，纷纷立商号、营商行。青岛、胶县城、诸城县城等地的商人也纷纷来胶南经商。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得廉价出卖农产品，高价购买日用工业品。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了破坏，但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依然保存下来。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 10%，但他们却占有 70% 的土地，而且多半是好地。境内群匪四起，他们抢、截、捐、绑，与地主勾结，狼狈为奸。加之连年遭遇水、旱、虫灾，整个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第二节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纷纷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受其影响，胶南民众也以大刀会的组织形式，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

1926年2月，以教书为业的今珠海街道办事处茆子口村民邓寿千在丁戈庄加入了大刀会。至1927年下半年，邓寿千与纪徇堂（今黄山区插旗崖村前清武举）在胶南境内40多个村庄发展会员近9000人。大刀会是打击官府、土匪，保护群众利益的群众团体，其会员多系性格强悍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口号是：“打土匪，抗捐税，先打张宗昌后打吴佩孚，大刀会来作主”。8月，邓寿千率茆子口周围村庄的100余名大刀会员举行暴动，先后斗争了茆子口、肖家庄、六汪等村的土豪劣绅，将其财物分发给当地百姓。同时，各地大刀会员也都组织自卫，进行

抗捐抗税，保护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天，近 300 人的土匪企图到宝山镇的李家沟村抢劫，由于该村和周围村庄大刀会员的共同抵抗，土匪未能得逞。

大刀会的暴动，使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惊。10月1日，张宗昌令胶东防守司令祝祥本派祝宏德、李吉祥两个团前来镇压。刚刚成立的大刀会及其成员，不畏强暴，英勇斗争。10月2日，邓寿千率领黄山以南地区的大刀会员北上，与纪徇堂率领的黄山以北地区的大刀会员汇合，向王台进发。其目标是：“打下王台进胶县(城)打下胶县(城)进济南，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10月5日，大刀会包围了王台镇。10月19日，大刀会在与军阀的交战中，杀死王台守军祝宏德团3营营长杨永举以下官兵42人，设在王台的县政府紧闭大门，县长王天伟死守待援。大刀会员攻城不克，遂退守黄山口。此时，官府一面增兵“围剿”，一面从青岛派飞机前来轰炸。在军阀强大军事打击下，加之大刀会缺少枪支弹药，内部纪律涣散，暴动最终失败。

大刀会王台暴动失败后，返回本乡的会员继续进行反抗斗争。插旗崖、刘家庄、韩家台、阿陀等村的70余名会员突袭了港头盐务局，砍伤3名盐司，俘虏7人。10月25日，薛家岛镇(今属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南屯村大刀会员又包围了红石崖盐务局。盐务局慑于大刀会的威力，乘船仓皇逃往青岛。1928年1月，灵山卫、红石崖等地民众数百人在徐戈庄孙鸿宾的率领下，捣毁了

薛家岛、红石崖等地的警察局，击毙盐警 20 余人。王戈庄、郭家河岩的民众同军阀部队进行英勇斗争。8 月大珠山地区的民众揭竿而起，反抗官府和地主豪绅的捐税。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第三节 党组织的早期活动

大刀会王台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会员转移到尧王山地区，与诸城的大刀会员汇合，继续战斗。为了将这次自发的农民运动引向自觉的武装斗争，1927 年 11 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中共胶高地方委员会分管组织和军事工作的委员宋琦^①和中共高密城市支部宣传委员管宗学^②潜入尧王山地区，同大刀会首领进行了秘密接触，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大刀会首领提高觉悟，并与大刀会首领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大刀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成革命委员会，成立土地革命军，并提出以下口号：（一）不准绑杀掠夺贫农及奸淫妇女（二）不还高利债务（三）耕田农有（四）取消民团（即联庄会）（五）杀尽土豪劣绅（六）杀尽贪官污吏（七）反抗苛捐杂税（八）打倒张宗昌（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联合一切革命群众（十一）拥护工农利益（十二）反对屠杀工农之国民党。然而，这支刚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经不起反动军队的强大军事打击，会员四散潜逃。党组织的早期活动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胶南农民武装反抗封建势力和军阀的英勇斗争，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势力。经过党组织对大刀会的宣传教育及收编工作，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在大刀会会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第一次感受到共产党是为穷人撑腰的，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为胶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大刀会的指导，使胶南大刀会的反军阀斗争纳入了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范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胶南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第四节 胶南籍早期党员的活动

一、薛文英

薛文英 1892 年 8 月生于薛家岛镇北庄一村一个贫苦渔民家庭。1924 年冬，他由刘子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任津浦铁路济南大厂党支部书记。1928 年 3 月，任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1930 年夏，被敌人摧残而不幸去世 时年 38 岁。

1899 年，薛文英在本村读私塾，后转入瓦屋庄学堂读书。1905 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10 年到潍县煤矿投奔做工的长兄薛文跃求学。1914 年考入津浦铁路济南大厂，被录用为帮工匠（当时工人的职务分为匠目、工匠、帮工匠、杂工、小工、徒工）。

当时，考工场设在大厂内一块空场上，3张考桌桌上放了笔、墨、纸张，桌后坐着德国总监工若斯特勒。考场一端摆了几袋装满了石、沙的草包，一根钢轨，一把大锤，几根木桩。第一关是背沙袋。考工开始，先让考工背起沙袋从考场一端的白灰线，背向另一端。第二关是扛钢轨。第三关是砸木桩。用大锤往地里砸木桩。三关通过，便可录取。轮到薛文英时，他把手一甩便走，并气愤地说：“不考了，我们不是来受外国人欺辱的！”若斯特勒听不懂这样复杂的中国话，但他觉得好奇，在这些考工中，这是唯一一个身穿大褂的人。见薛文英要走，他硬要管事把他叫回来，问：“你为什么不考了？”薛文英说：“背不了沙包，扛不动钢轨，也砸不下木桩。”若斯特勒说：“那你会写字？”于是，薛文英便提笔沾墨，挥笔写了“中国人”三个行书大字。当场监工们一齐叫好，“好字，好字。”若斯特勒便一口喝到：“帮工匠。”就这样薛文英被录用了，并连越三级，当了帮工匠。

1919年4月29日，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专使的多次抗议，正式决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宣告了中国外交的彻底失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如雷电劈脑，痛不欲生，奔走呼号。”这时，济南铁路大厂也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这一消息。法律专科学校和育英中学的学生来到工厂进行演讲，薛文英按捺不下悲愤的心情，带领工人高喊：“打倒卖国贼！”“勿忘国耻！”“力争主权！”此时，工厂警务室

派出警察驱赶学生和工人，薛文英挺身而出，与他们讲理：“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是山东人吗？山东自古是我中华之故土，我们应以自家生命来保护才对，你们的良心何在？”

薛文英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救国精神先后参加了 5 月 5 日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游行集会、济南各界人民在庠门内召开的群众大会、“国耻纪念大会”、62 团抵制日货大会、普利门外的工人集会等，并和数百名工人一起，于 6 月 19 日早晨，赶往火车站为山东各界赴京请愿团送行。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各项斗争，薛文英开始觉醒了，也开始了对人生道路的冥思苦索。

1920 年 3 月，齐鲁书社成立，薛文英从这里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与李广义一起研读，并在工友间宣传。是年底，王尽美、邓恩铭建立“济南康米尼斯特（共产主义）学会”。薛文英经李广义介绍认识了王尽美，王尽美经常邀请薛文英、李广义参加学会活动。1921 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经常通过薛文英的关系到济南铁路大厂活动。是年 2 月，薛文英与李广义、黄锦荣北上长辛店学习经验，回厂后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薛文英任俱乐部副委员长。8 月，王尽美向薛文英、李广义、黄锦荣讲解中共一大精神。之后，薛文英在夜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动工人开展反霸斗争。

1922 年 5 月 1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度》、《工会组织原则案》等决议案，初步实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大会之后，在济南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王尽美任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山东支部成立后，薛文英在工厂俱乐部、夜校积极宣传支部宣言，号召工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开展斗争。6月18日，济南铁路大厂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主任罗章龙、山东支部书记王尽美等人的组织、发动下，薛文英、李广义等联合数百名工人，并由薛文英主持召开了各厂代表参加的工会成立大会。大会讨论了由薛文英与王尽美起草的工会简章，选举薛文英为工会副会长。同时，薛文英与王尽美一起用‘求真’笔名发表《告厂友书》，为工会活动提出建设性意见。7月26日起，薛文英等人组织工厂工人揭露军阀、工场主、把头欺压工人的种种罪行，并向工场主提出了四项要求：年终发双薪，不准工头打、骂工人，休息星期日，不扣工薪；增加工薪。这四项要求遭到了工场主的拒绝。于是，薛文英率请愿团3次去天津（津浦铁路局设在天津）请愿。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津浦铁路局被迫答应了请愿团提出的12条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后，在军阀的镇压下，济南铁路大厂工会负责人黄锦荣在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的胁迫下叛变，致使大厂工会解散。

1924年10月，党组织派刘子久到铁路大厂开展工

人运动，恢复了被军阀封禁的工会，李广义任委员长，薛文英为副委员长。是年冬，薛文英由刘子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刘子久任书记。1925年2月7日，李广义和薛文英代表津浦铁路工人出席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初，经中共山东地方执委批准，薛文英担任大厂党支部书记。5月，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彭湃出席了大会。薛文英代表津浦铁路工会济南分会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劳动法大纲等12个决议案，发表了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直系军阀！打倒投降敌人、破坏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工贼及一切反动派！”薛文英回到济南后，立即到津浦铁路各站、段宣讲大会精神，贯彻大会各项决议案，并领导了铁路大厂索取欠薪的斗争。这一斗争遭到军阀张宗昌的镇压，薛文英等14名大厂共产党员和工运骨干及大批工人被开除出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5月20日，张宗昌在济南实行大搜捕，中共山东地执委机关被破坏，铁路大厂党支部也遭破坏。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192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会议，补选薛文英为省委常委。这时，薛文英除继续担任铁路大厂党支部书记外，主要负责整个津浦铁路党的工作

和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经常活动在德州至峰县沿线的各个站、段。7月，薛文英在临城检查工作时被捕。11月，经省委营救出狱。薛文英出狱后，着重发动了以济南铁路大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大罢工。这次罢工一直延续到1932年才取得胜利。然而，薛文英没有看到罢工的胜利，于1930年1月，在泰安、临城组织力量向敌人斗争时，由于叛徒出卖在临城再次被捕。

薛文英被捕后，经过几次审问，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敌人先是用细麻绳捆住他两手的大拇指，脱去他的上衣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他忍住剧痛一声不吭。遂后，就给他施穿铁鞋、夹板子等酷刑，薛文英始终坚贞不屈。连续酷刑拷问的折磨，使他很快变得骨瘦如柴。每当敌人审讯、侮辱共产党时，薛文英都以满腔激情严加痛斥，并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径，申明自己的世界观和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永恒的信仰。每次，又都引来敌人更残酷的刑罚；每次，又都使敌人更加失望。

硬的不行用软的。敌人专为薛文英准备了一间舒适的住房，一日三餐有酒、有菜。数日后，敌人一位高官来对薛文英说：“薛先生自古家风纯良、祖德深厚，又是贤达之才，如果不走邪路，本应前程无量，为薛氏先辈争光，何苦为那看不见、摸不到的什么共产主义受苦，甚至遭杀身之祸。”薛文英则列举许多事实予以反驳。来人非但不生气，反而摆了一桌酒宴，让特意从南京来的叛徒——原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元和作陪，劝说薛文英降服。